

#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出版成果展

**编者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是我国首次对全国范围内非遗保护工作出版成果的集中展示,自开展以来,不仅吸引了众多公众前往参观,非遗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此次展览十分关注,现将几位专家的观感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 世纪之初非遗保护的“星星之火”

**李新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看到几张世纪之初最早报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报纸,不禁让人感慨万端。

一张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文化报》,在头版最下方靠右的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主标题为《中国昆曲居榜首》的报道。另一张是两天后《人民日报》第七版刊登的“本报专电”《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布》。这两篇报道是国家级专业性报纸和全国综合性大报首次介绍我国昆曲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重要讯息。还有两张2002年12月的报纸,一张是9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我国启动大规模“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另一张是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引起关注》。两篇都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在8日至11日举办“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四篇报道,记录了我国新世纪以来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阶段的两项重大事件:一是“昆曲艺术”申遗成功,被公认为我国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起点”;二是2002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召开以“非遗抢救与保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大规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宏伟规划,为此后我国非遗保护制定了最初的“路线图”。

四篇报道,是世纪之初我国非遗保护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的生动写照。十多年前那一点微弱“火种”,今日正以燎原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为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带来无限生机与希望。

### 非遗保护呼唤数字化援手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实在超乎我的想象。这项工作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或许是今天的我们还难以准确估量的。

据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介绍,展览除选用馆藏的出版物之外,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和非遗保护中心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送来5000余件展品。这些图书和音像制品,既承载了保护实践的某一具体环节和内容,同时也为宣传和弘扬非遗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音像展示区展出的全国各地与非遗保护有关的音像出版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其中,《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像集》包括了上百张光盘,全面记录了山东省首批非遗名录项目,而这些展品仅是十余年来大量音像出版物中很少的一部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著录在册的各地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有近600种,其中音像制品占2/3以上。至

于为保存、保护、研究、宣传非遗而制作的非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更是不计其数。

运用数字化手段,能够多角度、直观生动和比较全面地记录、保存和传播非遗的真实信息。今天,数字化手段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现出它无限的魅力。数字化手段的推广俨然可以以文字手段的发明和应用相媲美,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体地说,也为贯彻非遗保护的整体性、真实性和传承性原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非遗保护的各个环节不仅呼唤数字化手段的支持和广泛应用,而且数字化手段还可以为非遗真实有效的传承提供有利条件。今天,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习惯性地录音、录像简单地视为和使用纸张一样的记录手段。我想这是不够的。我们还没有把数字化手段在非遗保护方面的巨大效能充分发掘出来。如何更好地、更深层地运用数字化手段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这也是摆在非遗保护工作者面前需要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 传统医药出版进入丰收季节

**诸国本**(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传统医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某些民间草医药。近30年来,各地做了大量的发掘整理工作,已经整理出版民族医药原著、汉文译著和采集整理以后用汉文编写的民族医药著作200余种。其中,除中医药以外,涉及40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目前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成果相当丰富。现存的藏医学古籍总数至少在1200种以上。2012年青海省整理出版了《藏医药大典》,共60卷,6000万字,收录了638部藏医学古籍及部分近代论著。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均已译成汉文出版。蒙医学方面,伊希巴拉珠尔的《甘露四部》、占布拉道吉的《蒙药正典》和敬如勒·占布拉却吉丹增的《方海》三部蒙医经典均整理出

版,同时出版了《蒙医志略》等近代著作。维吾尔医学除出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维吾尔医学》卷以外,还出版了《维吾尔医气、体液论及其现代研究》等一批著作。傣医学不仅整理出版了《档哈雅龙》等一批古籍,还编著了7本“傣医本科教育规划教材”。朝鲜医学是发掘整理较早的民族医药,2005年校译出版了《东医寿世保元》等5种古籍,编写了《中国朝鲜民族医学史》等著作。

在我国各民族医药中,许多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其传统医药也弥足珍贵,如壮医学、苗医学、土家族医学、侗医学等,都出版了各自的民族医学史、医学概论、药理学以及临床各科治疗经验,使这些口头、无形的民族传统医药,增加了有形的文传载体,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苗药、彝药等民族药的开发生产,其他教学、科研活动也十分活跃。

### “大数据”是最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兹从展览形式、少数民族文化和学科建设三个方面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的个人感受。

首先,“大数据”是本次展览最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本次展览形式多元立体,音、影、图、文一应俱全,但本质上都离不开数据。根据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统计,2001年至2013年,已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著15800余种、学位论文4600余篇、学术期刊论文21500余篇……大数据时代,我们或许不应斤斤计较于数据的精确性,但需要认真分析数据的关联性。实际上,数据是会“说话”的。例如,本次展览的“数说”非遗出版成果”中所显示的报纸文章成果,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出平稳状态,恰恰说明非遗已被大众所接受,这才是常态的发展趋势。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成为非遗保护项目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调查和搜集少数民族地区

的传统文化,将他们的历史、文化、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信仰体系等加以整理和出版,应该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在我国,非遗出版物中,民族语言专著已达到800余种。其内容囊括了非遗的十大类别,所涉及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锡伯文、傣文等。涉及非遗的民俗类有120余种,报纸100余家。此外,还有不少非遗的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物。

再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业的学术理念对非遗保护与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非遗研究中心以及开设非遗相关课程。本次展览提供的数据显示,民间文学类和民俗类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69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38人,两类出版成果专著有2348种、学位论文471篇。由此我们可以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业在非遗学这一新兴专业之外,秉承“从传统文化中来,到民众中去”的学术理念,对非遗的保护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两年,常听到一些非遗保护工作者感叹:“这几年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大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已经逐渐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无论在保护工作开展的宏观方向上,还是具体保护措施的实施上,都有了许多政策和理论上的支撑,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走上了整体性、系统性、法制化的道路。”而其中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近年来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指导下,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出版的一大批非遗保护研究成果。

6月14日,由文化部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联合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在国图举办。此次展览是我国首次对全国范围内非遗保护工作出版成果的集中展示,1800余种、3000余册图书和100余部非遗纪录片的展出,吸引了广大读者驻足观看。展览将于7月20日落下帷幕。

展览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我国非遗保护1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时间轴,将重要的出版成果与非遗保护大事件相呼应,配以生动的视频和文献实物予以展示;第二部分是各类非遗项目的出版成果精品,内容涉及法规与政策、普查与名录、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等,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等领域;第三部分是各省区市选送的非遗保护出版成果摘要;第四部分“数说”非遗出版,对相关出版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与分析。

#### 成果首展亮点纷呈

2001年5月18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在宣布的19项代表作中,中国昆曲艺术名列榜首,这是我国第一个入选名录的项目。2001年5月22日,《中国文化报》头版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中国昆曲居榜首》为题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这是有关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消息首次见诸报端,也是“非遗”这一字眼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除此之外,此次展览还以展板和实物的形式,记录了非遗保护中的许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的召开,第一次非遗普查工作部署,第一次非遗保护成果大展的举办,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公布,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授牌,等等。在长达300余米的展线中,主办方以“非遗保护大事记”的形式向读者直观地“讲述”了我国非遗保护进程中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应该说这些展出的出版成果,汇聚了作者、出版机构和保护单位的心血,即使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出版方也是精益求精,从选材到呈现方式都体现出了创作团队的精品意识。比如,一套由浙江选送、西泠印社出版的“余杭非遗代表作连环画丛书”,画面精美、形式活泼,堪称精品。“它用连环画的方式描绘了杭州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州运河船民习俗、杨乃武与小白菜传说等内容,此套连环画是邀请浙江著名画家主笔的。如今再策划一套这种品质的丛书,恐怕要价格不菲了。”

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王森说。在主办方精心挑选的展品中,记者还有许多新奇的发现。比如,一本由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就是一部较早的外国学者论述中国民间文学的作品。李福清以一个汉学家的独特眼光和视野去观察和研究东方民间文学,他的发现和提出的问题,都能给中国学者以启迪。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瑰丽多姿、博大精深,其实自近代以来便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国内相关学术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与该书并列的同一个展柜中,主办方还

陈列了许多由我国学者翻译出版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专著,如2008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介绍中国民间剪纸的专著《Folk Papercuts》,就对剪纸这一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艺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关于中国非遗的译著已达200余种,涉及英、法、俄、日、韩等语言,其内容多关涉理论研究、法律法规等方面。这种交流不但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和认同。

其实,我国在非遗保护工作进程中一直十分重视推动国际间的合作。近年来,我国相关机构举办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通过展览、演出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让世界看到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也以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保护工作的开展。

#### 研究成果成绩斐然

2006年6月10日,我国第一种非遗专业期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刊在京举办首发式;2006年10月,我国第一部非遗理论专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王文章主编)出版;2006年12月11日,我国第一部以非遗为主题的大型纪录片《中国记忆》在央视播出……据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统计,自2001年以来,我国已出版非遗研究专著1.5万余种、学位论文4600余篇,报纸刊载相关文章2.9万余篇。非遗保护的出版研究成果成绩斐然。

针对如此浩繁丰富的出版成果,主办方按照出版物的内容与类型、非遗十大门类以及各省区市的非遗出版情况对参展出版物进行了分类布展。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梳理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的出版研究成果,其中理论研究成果备受瞩目。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成立相关非遗研究机构,为该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次展览对近10余年来非遗出版物出版趋势的数据分析显示,自2001年至2013年,学术期刊发表的非遗保护相关主题论文2.1万余篇,呈逐年递增趋势,并于近两年逐渐趋于平稳。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一大批理论层次高、影响广泛的理论研究成果问世,可见非遗相关学科的建设已初见成效。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一路走来,基本上没有走弯路,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重视“中国经验”的创造和总结;三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另外,引入专家学者力量,为非遗保护提供智力支持,也是一条不能忽视的经验。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之初,文化部便组建了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各省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专家委员会,对当地科学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 展览方式立体多元

“为了让公众对此次展览有更深的了解,我们在布展时也颇费思量,提供了立体多元的展示平台。”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说。

主办方在展厅内特设非遗出版物阅读体验区,是为读者开辟的专享阅读空间,无需刷卡便可在设置了开放式书架、地毯、沙发、绿植、平板电脑的空间内舒适地阅读,还可体验非遗题材软件的应用。

出版成果展还与同期在国图举行的“非遗保护讲座月”活动有机结合,展讲互动。自2007年以来,国图每年都会举办非遗讲座活动。2012年,文化部非遗司首次联合国图面向读者举办非遗保护系列讲座。今年继2012年和2013年的“讲座周”之后,首次推出“讲座

## 风雨十年 珍贵结晶

本报记者 王学思

在内容、持续时间以及受众面和影响力等方面又有了新突破。成果展利用讲座月这一优势进一步扩大受众群体,比如,此前举行昆曲、古琴等主题讲座时,成果展展区就将相关的书籍进行了集中展示,在视频观展区播放相关音视频资料,并同期举行表演活动。

自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以来,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非遗宣传工作,因为人民群众是非遗的主人,人民群众遗产意识的提高是对非遗最好的保护。为了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我国专门设立了“文化遗产日”。近年来,文化部和各地文化部门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组织开展了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珍稀剧种展演、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许多重大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识、了解和喜爱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调动他们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如今,普通民众,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认同感、自豪感和参与意识都普遍提高。基层民众的积极响应,人民群众遗产意识的增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发展具备了深厚的基础。

#### 展出效果广受好评

“非遗出版成果展是否能如其他主题展一样凝聚人气?”在展览举办之初,主办方还心存忧虑,可自展览开幕以来,这份担忧便被络绎不绝的读者抹去。

读者的认可从非遗出版成果展留言簿上密密麻麻的好评中便可见一斑。许多读者都觉得这次展览举办得很有意义,更为深入地让大家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河北保定市的史先生是国图的常客,在阅读体验区他正在认真地读着一本有关苗族医药的图书:“我本身对传统医药十分感兴趣,展览展示了许多民族地区的医药类书籍,真是大开眼界。”

山西、浙江、黑龙江等省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也专程来京参观展览。“看到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非遗出版成果,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觉得既激动又欣慰,因为在一部部专著、一套套丛书背后凝聚的是无数非遗保护专家、学者、工作者的辛劳与汗水。”黑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孙亚强说,“非遗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为各地许多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将二三十年的田野考察成果汇集出版的平台与经费支持,这使得许多学术理论能够真正应用到具体实践中,指导具体的保护工作。”

许多非遗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观看了展览后也纷纷表示,此次出版成果展是对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风雨历程的一次系统梳理,是对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理论研究的全面展示。



读者在国图古籍厅认真阅读各省非遗出版成果